

杨浦记忆

我的小学生涯(上)

■邱伟坚文

我1962年入读的是今天仍位于杨浦区控江路凤城路口的凤南新村小学,学校貌不惊人无甚名气,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没有搬迁过位置,只是现在校名更换了。

凤南新村小学因为毗邻凤南新村(即俗称的新村公房)属上钢一厂职工家属区之一,里头的居民十有八九是该厂员工,这所学校就是为上钢一厂员工子女而建,属于货真价实的职工子弟小学;校长及教导主任由区教育局选派,而教师绝大部分由上钢一厂派遣。子弟们只要一纸单位证明,皆可享受学费一半的优惠,直至小学毕业,我每个学期学费只要交纳3元钱(非职工子弟要6元)。当然假如够上条件,所有学生均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政策,许多老工人家长往往为此不安,即使符合条件也予以舍弃。记得班主任在每个学期开学第一次家长会上,不时会表扬一两个本可以享受减免而拒绝的家长。

当时学校里头只有一幢三层楼的灰色校舍。竹篱笆圈起的硬地操场面积很大,一直延续到控江路边上;直到1965年后,挨着马路造起几排住宅楼,才将大半操场划走。

要说有出挑的地方,大概是校舍南拐角处一排“红领巾”无花果树了。无花果树外表朴实无华易于栽培,每到夏季,繁茂的枝叶像蒲扇一般遮住骄阳。学校中也有无花果树一样秉性的老师。班主任殷锦华老师是二年级时接手我们班级的,由于之前的班主任经常病假,很多同学的学习成绩因无人督促而一塌糊涂,每天下午放学后,殷老师会召集

一些学生留下补课,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钟。不仅功课开小灶,还要给他们买点心开小灶;每到傍晚五点来钟,她就掏出自己的粮票和钱来,吩咐座中的同学去买糕点来分给大家充饥,二年级的小学生还是懵然无知的年龄,忸怩一番也就不客气了。但点心不是三五天的事情,一两个学期下来,或一个大饼或一个糖糕,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何况殷老师自己家还有一双儿女。时间一长家长们知道了,除了补上一番迟来的感激还欲补上粮票和钞票,她却一概不收,实在推脱不了才拿上几两粮票,座位上的学生玩性再重脾性再木讷,目睹这一幕后也不由暗自用功起来。

班上有个女同学,她母亲在街上摆了个水果摊,她天天相帮母亲照应早晚生意,小小年纪就品尝到生活五味,但是她每天的作业却一点不含糊。殷老师决不允许班上有有人歧视她,还将她作为学习的榜样,经常在班会上予以鼓励,至今仍记得她的话语:“同样的分数,她花出的精力至少是其他同学的两倍!”殷老师只要买点心会给她留一个,自家做的袖套悄悄递给她一副……每学期考试结束后,殷老师总会买上些练习本铅笔等来奖励科目考试优秀的学生,尽管该女同学分数未名列前茅,也会给上一份。1972年底我下乡前与同学一起去殷老师家看望,她还一一叫得出在座同学的名字!

在这座简朴的校园里,我们除了念书之外,课外还参加无线电、书法及航模等兴趣班,拓宽课本之外的知识;六一、十一学校组织的文艺晚会上,随着嘹亮的小号声,和小伙伴們

一起在主席台一侧敲起“咚咚叭叭”的队鼓;穿着白衬衫蓝裤子上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还到位于长阳路上的杨浦少年宫玩耍“勇敢者的道路”等娱乐活动,见识了学校以外的天地……

在即将升入五年级的1966年下半年,所有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按部就班的读书时光转眼即逝,自此以后直至中学结束,我就再也未能念过正规的书了。其实自1965年那番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以后,学校的教学次序就无章法了,直到那年夏天总爆发。校长、教导主任第一个佩起红袖章戴上红像章摇着小红书领着学生们念语录、音乐老师教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门厅处张挂出报纸讨伐三家村、海瑞罢官等文章、走廊墙壁等刷满了标语大字报;到后头曾带头佩起红袖章的校长、教导主任戴上高帽子批斗、教室玻璃全部被砸光……这时候还想正常上课,包括敬业的殷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都徒呼奈何了。

小学生们一下子摆脱了老师和作业的束缚,好比是脱笼之鸟漏网之鱼,和大人們一起步入疯狂岁月。真的是“人来疯”啊,大白天去街头看红卫兵们围追堵截,剪路人的尖头皮鞋、小裤脚管和长波浪头发,年轻女子眼眶中饱含泪水满脸通红;这让我如何回去?或者结伴上公交车去念语录唱语录歌,有时一个车厢里聚集着五六组像我们一样的小学生,充盈着此起彼伏的语录歌语录声……售票员听得不耐烦了,朝我们翻白眼,有乘客支持说“唱唱蛮好,让阿拉解解气”;晚上仍游荡在街头听大中学生和工人們大辩论,互相打语录仗,人家在说什么其实都不明白,图个新鲜罢了……凌晨兴冲冲回到家中,被家长挨头一顿臭骂:小鬼头,依听得懂啥?明朝不去小菜场买菜啦?



皎洁如雪 ■李德生

我的40年

难忘当年招工经历

■胡孝龙文

我有一张招工录取单,质地粗糙,薄薄一片纸页,很不起眼。距今39年了,我至宝般保存如新,只因为它是我漫漫人生长路一个重要拐点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数十万下乡知青按照政策几乎同时返回了上海。大量年富力强的劳动力的涌入,造成本市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为化解这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市政府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广开就业渠道,为回沪知青量身制定了“顶替”和“进大集体”两条政策,但由于岗位有限,前置条件比较苛刻,难以解决大部分知青的就业问题。1979年下半年,市里统筹安排,决定提供2万个全民所有制工作岗位,开展一次性招工工作,未被录取者将分配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里弄生产组,否则便成为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

这次全民招工行业众多,工种五花八门。记得我所在南市区的招工简章中,工种指向明确,虽然冠以“全民”称号,但大多是最苦、最累、最脏的工种,如翻砂工、捉蛇工、捕鱼工、挡车工等等。即便如此,因僧多粥少,竞争力强的人才能被录取。历数百个招工单位,最令人向往的只有两个行业——银行和公交公司,但招工要求比别的招工单位高很多,如对身体、容貌、身高、政治条件等都有一定要求,此外还要考文化知识,择优录取。

下乡期间,因兴趣和志向使然,每当晚上收工后,我坚持在煤油灯下自学,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尽管意识到热门行业报考者踊跃,而且人人怀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底气,竞争的激烈和残酷可想而知,但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报考公交搏一把。原因在

于,当时公交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职工的工资待遇不错,奖金就有6.42元,据说是全市各行各业最高的。尤其是蓝色工作服,上面印有远看是公交车,近看是公交两个字的红色标记,十分“弹眼落睛”。有些人甚至将工作服作为“出客服”,大大方方地与恋人约会或者上岳父家婆婆家,绝无寒碜之虑。

8月下旬,南市区针对公交公司的招工考试在市八女中举行。考试过程中,时不时有人愁云满面提前离开了。每当有人离场,都令我对每道题的解答更加认真和仔细,不敢有丝毫懈怠,力争在能力范围内考出最好成绩,哪怕增加1分甚或是0.5分。

一周后,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体检。通过街道带队人员得知,南市区参加公交公司统一文化考试的共有近千人,录取名额40余名,来体检的都是考试成绩最靠前的。体检十分严格,有位姑娘因身高比要求的1米58差了一公分,被刷了下来,再三苦苦央求未果。众人唏嘘不已。

9月中旬,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署名为公交汽车五场寄来的信件,直觉告诉我,“有戏了!”打开信封,里面正是《全民招工报到通知单》,那种兴奋与激动真的无以复加,学子金榜题名可能也莫过于此。

此次共有192名回沪知青经考试进入地处浦东的公交汽车五场。因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砺,大家十分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积极向上,表现优秀,得到全场上下一致肯定。上路工作没几年,绝大多数人就先后被提拔到了各个管理工作岗位上,成为公交汽车五场经营发展的中坚力量。

文苑投稿邮箱:
zfk@vptimes.cn, 欢迎投稿

诗抒胸臆

夜读

■冯如

中天半寐昏黄月,
几处幽窗皎皎明。
漫读诗书香雾绕,
遥思风骨玉珂鸣。
青春仗剑多言志,
白发怀乡更重情。
滴去蛮荒三万里,
仁心随意写平生。

雨后晚晴

■茅献鹏

天上云深,
空中雨细。
草含花羞空滴翠。
连绵阴雨雨生根,
湿潮难耐黄梅季。

雨歇雨停,
云飞云退。
晚霞绚丽夕阳坠。
余晖脉脉倚巧云,
巧云画出青天丽。

咏广玉兰

■李德生

碧树枝繁叶油光,
翠蕾乳苞孕芬芳。
琼花皎洁寄高雅,
玉盘金盏映辉煌。

岁月悠悠

我与僧尼成“同学”

■姜德福文

每年赶上高考这几天,我都颇有感慨。

被列为考点的学校附近,和部队上搞军事演习差不多,戒备森严;出动警察,维护秩序;封路限行,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过;汽车不许鸣笛,建筑工地停工……生怕整出动静,惊了正在赶考的考生。

“老黄历”不能翻,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不太好做对比。但想想自己小时候的读书环境,也还是蛮有趣的,或许能给今天的教学一点启迪。

我是在全国解放后的第一年的小学。那时候,农村没有学校,我的小学是在庙里读的。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在村口的小庙里,政府和庙里管事的“老师太”协商后,腾出一间厢房来,放上桌椅板凳,挂上一块黑板,就是我们的教室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同时教。往往是一年级讲新课、二年级复习、三年级做作业,然后到下一课时再轮换。遇到有什么情况,老师还会停下这个班级的课,去处理另一个班级的事,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四到六年级是在离家有四、五里地远的一个大庙里念的,因为庙大,腾出的房间多,每个年级都有了固定的教室。无论是到了大庙还是原来的小庙,庙里的僧尼们在“老师太”的带领下,

也要天天“上课”。我们在教室里,老师领着我们读课文。而教室门外的大殿上,僧尼们也在念经文。她们有很隆重的仪式,比我们正规多了。首先,服装统一,一律黄颜色的长袍,神情十分庄严,有时还要磕头下跪。其次,声音拖腔控调,忽高忽低,很有韵律感,尽管听不清她们念的是什么,能记住的一句是“那摩阿弥陀佛”。再次,她们还时不时的要撞几下钟,撞几通鼓,而且每个僧尼手里有个木鱼,不停地边念边敲着。就这样,我们和“僧尼”成了同学。

尽管僧尼们闹出的动静很大,且天天如此,倒也相安无事,我们习惯了,并没有因为要考试、要测验、要学习,要求他们停止这些容易干扰我们的活动。特别是赶上初一、十五的庙会,四面八方赶来的香客络绎不绝,庙内庙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我们该上课上课,该考试考试,有的同学最多出于好奇,透过教室的窗户偷往外边看几眼,好像也没啥大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感到奇怪,那时候的学生抗干扰能力咋这么强呢?

最近,看到一篇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在湖南长沙求学时的文章,毛泽东为了培养自己抗御外界干扰的能力,专门到长沙的闹市区、街头、集市边上去看书学习,你吵你的,我看我的,丝毫不受影响。